

· 中药文化 ·

宋代药业官营民营并举与农工商体系初步形成

唐廷猷*

四川省食品药品学校, 四川 峨眉山 614201

【摘要】 宋朝建立在五代十国分裂战乱、经济处于崩溃的基础上, 因而赵宋立国就加强中央集权、大力恢复发展经济文化。最重要的措施是: 废除 2000 年来束缚商业发展的“坊市制”, 大力发展官营、民营工商业和对外贸易, 开办各级学校教育, 减轻农民、商人赋税, 使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获得空前发展。宋朝对发展医药尤其重视, 表现为大力整理、编修医药书籍; 开办医学教育培养上医和药材种植人才; 提高医药人的政治与社会地位; 积极发展官营药业, 带动民营药业进步, 使城市药铺普及, 药市、制药作坊与药材规模种植兴起, 药业获得农工商体系初步形成的大好局面, 谱写了中国药业史上的光辉之页。

【关键词】 宋代药业; 官营药业; 民营药业; 药市; 制药作坊; 药材种植业

【中图分类号】 R2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4890(2020)12-2094-09

doi:10. 13313/j. issn. 1673-4890. 20200616003

Development of Medical System and Pharmaceutical Commerce in Song Dynasty

TANG Ting-you*

Sichuan Food and Medicine School, Emeishan 614201, China

【Abstract】 The Song Dynasty wa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the division of Five Dynasties and Ten States. Therefore, the Song Dynasty strengthened centralization and vigorously restore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culture. The most important measures are: 1) Abolish the "market system" that has restricted commercial development for 2000 years, vigorously develop trad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private, establish schools at all levels, reduce taxes on farmers and businessmen. 2) The Song Dynasty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A great number of medical books has been edited and published that time. 3) Opening medical education to train medical professionals and medicinal planting talents. 4) Improving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status of medical professionals. Above all,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has achieved a good situation in the initial form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system, which has written a glorious pag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Keywords】 medical industry in Song dynasty; official pharmacy; private pharmacy; medical market; pharmaceutical workshop; medicinal plants

宋朝建立在五代十国分裂战乱、经济处于崩溃的基础上, 因而赵宋立国就加强中央集权, 大力恢复发展经济文化。为振兴经济, 实施的重要措施有废除 2000 年来束缚商业发展的“坊市制”, 大力发展官营、民营工商业和对外贸易; 开办各级学校教育; 减轻农民、商人赋税。这些措施使当时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获得空前发展。

宋朝对发展医药尤其重视, 认为是“仁政之急务”。这一时期官府主持大力整理、编修医药书籍; 开办医学教育培养上医和药材种植人才; 提高医药

人的政治与社会地位; 积极发展官营药业, 带动民营药业进步。使城市药铺普及, 药市、制药作坊与药材规模种植兴起, 药业呈现出农工商体系初步形成的大好局面, 谱写了中国药业史上的光辉之页。

1 建立官营药业工商体系

1.1 王安石变法市易务中设“卖药所”

熙宁元年(1068年), 20岁的宋神宗赵顼(1048—1085年)继位, 面临年财政赤超千万缗(一缗为一千文钱)的困难局面。赵顼起用王安石寻找出

* 【通信作者】 唐廷猷, 主任中药师, 研究方向: 中药药业史; E-mail: tanghai116@126.com

路,王安石推出了一系列新法。熙宁五年(1072年),王安石推出针对城市商业改革的市易法,国家发展官营商业。在中央成立“常平市易司”,在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和杭州、扬州、成都、广州等全国21个大中城市设“市易务”,市易务中设“卖药所”,零售国家医学教育机构“太医局”所制熟药(成药),以达惠民与增收的双重目的。

1.2 宋神宗初创官药局“太医局熟药所”

熙宁九年(1076年),宋神宗诏令成立新的“卖药所”,制造成药面向社会销售;新卖药所归太医局管理;任命光禄寺丞程公孙、三班奉职朱道济为新卖药所首任主管^[1]。同年六月,京城卖药所以“太医局熟药所”之名开业。简称“熟药所”,亦称卖药所,习称“官药局”。新开业的官药局销售红火,第一年即获利25 000余缗,为投入资金的1倍。程公孙、朱道济也获提前晋升嘉奖。

1.3 宋徽宗朝官药局鼎盛达70局

崇宁二年(1103年),熟药所增加到5所,另设2所修合药所专事成药生产;隶属关系由太医局转到太府寺,太府寺增设太府丞一职专职管理,户部负责检查。元丰改制后,太府寺升为掌管国家财政令、商税、贸易的中央机关,官药局地位上升,并将熟药所改名“惠民局”,修合药所改名“和剂局”,每所和剂局定员30人。大观三年(1109年),宋徽宗诏诸路会府置药局,各局所卖熟药由京城和剂局统一供货,官药局便在全国陆续推广。淮东、淮西、襄阳、四川、陕西及各路会府都先后开办,盛时全国达到70局,形成了庞大的官营药业工商体系^[2-3]。

1.4 南宋加强官药局规范化建设

绍兴六年(1136年),宋高宗批准置局奏请,诏京城临安置官药局,共置5所惠民局、1所和剂局,并诏:“药局印记,‘和剂局记’四字为文。撰合假药,伪造贴子印记作官药货卖,并依伪造条罚。”^[1]和剂局建在太府寺内之右。5所惠民局中3所在城内,2所在郊区。城内3所是南局在三省前,西局在众安桥北,北局在市西坊南。郊区2所,南外局在浙江亭,北外局在北郭。绍兴十八年(1148年),京城官药局更名为“太平惠民局”。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宋高宗又诏诸州置药局,均用“太平惠民局”之名,朝廷发给成药配本《太平惠民和剂局方》^[2]。

南宋官药局的快速发展尤其从以下三方面体现:一是宋高宗朝针对提高官药局质量及安全管理方面出台不少新政;二是《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先后4次修订,完善官药局生产标准化规范化管理;三是根据形势变化需要,及时发展地方官营药局。如平江府(今苏州)庆元元年(1195年)太府寺已建太平惠民局,1231年地方政府又办“济民药局”。建康(今南京)官药局发展到3所11家子铺。

1.5 蔡條、周密对官药局的评价与总结

官药局药品质优价廉、服务好,因而顾客盈门获利丰厚,受到社会称赞和朝廷嘉奖,不少宋人著作记载了当时一些盛况。

蔡條《铁围山丛谈·卷六》记载:“都邑惠民多增五局,货药济四方,甚盛举也。岁校出入,得息钱四十万缗,入户部助经费……时上每饬和剂局,凡药材告阙,俾时上请焉。”^[4]¹⁰²释义为:京城惠民局增加到5所,卖药使四方百姓受益,这是一个重大的举措。年终结算资金出入,可获利润40万缗,交户部助经费使用……当时皇上常告诫和剂局,凡是药材原料告缺,要即时向他报告。

崇宁年间(1102—1106年),全国财政年收入6000万缗,京城官药局5个惠民局年上交40万缗,占0.67%,是一笔很可观的数目^[2,5]。可见当时官药局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则记载较详:“和剂惠民药局,当时制药有官监造,有官监门,又有官药。药成分之内,凡七十局。出售则又各有监官。皆以选人经任者为之,谓之京官局。皆为异时朝士之位者,悉属太府寺。其药价比之时价损三之一。每岁糜户部钱数十万(缗),朝廷举以偿之。”^[6]此段译为:和剂惠民药局,在宋徽宗时,制药有修合官主管生产过程,有监门官检查进出物料。产品称为官药。官药完成包装后,分送京城内外各局,全国共有70局。销售又各有官员主管。都选派能够胜任的人担任,称为中央官药局。这些中央官药局,都是那时朝官的供职部门,全都隶属太府寺管理。官药局药价,比当时民营药业价格低1/3。每年可向户部上交利润数10万缗,朝廷都给予奖赏。周密是南宋著名文学家,又喜好医药^[2]。南宋理宗景定二年(1261年),周密以祖荫在临安任和剂局主管,进入业内人士,他的记载真实可信。

1.6 官药局意义重大与经受考验

第一,官药局使宋代药业出现了官营、民营2种

所有制并存局面,两者相互竞争、补充,有利于药业发展。第二,官药局网点增加,改善了城乡人民的医药供应,有益于破除巫术迷信。第三,官药局颁行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成药配制的国家标准,为宋代及后世成药生产、推广起了很大促进作用。第四,官药局是宋朝国家级成药生产经营实业,规模相对较大。产品以成药形态流通,提高了药品附加值,起到了促进经济效益,带动药材生产流通的作用,使药业的整体水平和医药分业上了一个新台阶^[2,7]。

因推动变法触犯官僚权贵利益,王安石一直受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和攻击。执行中又犯政策扩大化及政府垄断市场,使市场繁荣受损、贫民失业导致民怒。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被迫罢相,出任故里江宁(今南京)知府。熙宁八年(1075年),王安石复宰相之位。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再次被罢免,退居至江宁不出,封为荆国公。此后,由宋神宗亲自主持变法推行。1085年,宋神宗逝世,不满10岁的小儿宋哲宗赵煦继位,实权落在垂帘听政的宋神宗母亲太后高氏手中。高氏出身大官僚家庭,耳闻目睹皆为反对新法怨言,因而早就不满宋神宗支持新党变法。垂帘不久,高氏即宣布停止新法,起用反对变法的旧党核心人物司马光为宰相,推行了16年的变法终被废除。1086年,王安石抑郁而终,但是官药局的建设于国于民都有利,也并未触犯官僚权贵利益,因而得到继续发展。

2 民营药业农工商体系初步形成

2.1 城市药业

北宋京城汴梁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大城市,已逾100万人,极盛时过150万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宋徽宗政和至宣和年间(1111—1125年),开封有名号的药铺有21家:大内(皇宫)西廊南去有百种丸药铺,御廊西有香药铺,潘楼东旧曹门街有李生菜小儿药铺、仇防御药铺,牛行街有刘家药铺;马行街北的药铺特别集中,有大骨传药铺,金紫医官药铺有杜金钩家、主营独胜丸的曹家、主营口齿咽喉药的山水李家,小儿药铺有石鱼儿班防御、银孩儿柏郎中家,还有任家产药铺及香药铺;大内西右掖门外有张戴花洗面药、丑婆婆药铺,于道士卖齿药、荆筐儿药铺、盖防御药铺,大内前州桥东保康门有潘家黄芪圆,寺东门街有孙殿丞药铺、宋家

生药铺^[7-8]。

此外,摆摊、走街卖药亦不少。例如,大众娱乐场所“瓦子”中有人卖药,“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有人卖药^{[8]20-21},御街州桥至南内前一带,有早晨卖药的小贩,适应京城人赶早市习惯。有个叫张涣的草泽医,卖药来到都下,恰遇宋徽宗太子发病病,名医诊治未效,召张涣入宫治愈,官至翰林医正。

南宋京城临安(今杭州),盛时人口已过120万人。药业经营分工更细,兴盛超过汴梁。吴自牧《梦粱录·铺席》记载,宋理宗淳祐年间(1241—1252年)有名号的药铺有18家:猫儿桥潘节干熟药铺,五间楼前张家生药铺,狮子巷口观复丹室,保佑坊前讷庵丹砂熟药铺,中瓦子前陈直翁药铺,梁道实药铺,金子巷口杨将领药铺,官巷前仁爱堂药铺,修义坊三不欺药铺,官巷北金药白楼太丞药铺,漆器墙下李官人双行解毒丸,外沙皮巷口双葫芦眼药铺,太庙前陈妈妈泥面具风药铺,大佛寺瘡药铺,保和大师乌梅药铺,三桥街毛家生药铺,石榴园金马杓小儿药铺,沿桥下郭医产药铺^[7,9]。

这18家药铺也只是一部分。清河坊有蒋御药家,每到元夕,“闲(空闲地)置雅戏烟火,花边水际,灯烛灿然,游人士女纵观,则迎门酌酒而去”,可谓大铺,没有记载下来。小药铺可能更多。宋孝宗患痢,宫内众医治而不效,太上皇赵构十分忧虑,一日带随从巡市,遇见一小药铺,店主严姓,遣随从问能否治愈。答曰:专科。遂引入宫。严氏用新采藕节研细,用热酒调服,数服而愈。赵构大喜,赐以捣药金杵臼,并授荣誉性的防御使之官。世人称呼“金杵臼,严防御”。临安还有不少小本药摊,专卖膏药、手皴药、药线、香药、鼠药、蚊烟、荷叶、香囊等小商品^[7]。

两宋时期,京城内的药肆经营具有独家性,生药铺专门经营药材批发,熟药铺专门经营成药,药铺名未冠“生”“熟”经营饮片配方。生药铺之批发,多为针对零售铺的二级批发,类似后世的拆药铺。而小儿药铺、眼药铺、风药铺、瘡药铺、乌梅药铺、丹药铺(丹室)、口齿咽喉药铺及卖独门成药药铺^[7],是表示各自的经营特色和销售服务对象;那些流动药摊及卖膏药等小经营,则是对大药铺经营不足的一种补充。

零售药业扩大,推动药材贩运业、批发业和加工业发展。孟元老形容开封药材市场是“香山药

海”，可见规模庞大。临安不仅有综合性的“炭桥药市”，还有“川广生药市”“象牙玳瑁市”和“珍珠市”3个常年专门市场^[10]。

临安的民间药商率先于全国开办专事饮片、成药生产的“生药饮片”和“熟药丸散”作坊，是记录在案我国最早由个人经营的饮片、成药实业。制药作坊详细内容见2.4。

苏州在政和三年(1113年)升为平江府后，药业发展很快，城内药铺林立，形成药市街和药材市场。宋徽宗、宋钦宗时内侍李从之也在城内开起大药铺，雇人甚多，外州县购药者日众。郭姓药家，制丸用朱砂为衣，称朱砂丸，新奇瑰丽，世人争购，因而成为巨富。朱姓药家，灯夕之盛，号称天下第一。药商江仲谋，于府内饮马桥南启熟药铺，绍兴五年(1135年)，又在常熟梅里镇启一肆，生意都很兴隆，成为平江府的著名药商。

建康(今江苏南京)，药业有生药铺、熟药铺分工。《游宦纪闻·卷五》记载：“辛弃疾在建康为官时，一次忽得疟疾，阴囊坠重胀大如杯。有道人叫取叶珠，用东壁土炒黄色，水煮烂，入砂盆(粗陶乳钵)内研成膏，每次用无灰酒(未加石灰液沉淀的粮食发酵酒)调服二钱，即消。叶珠是鲜薏苡仁别称，城内没有，只于生药铺买薏苡仁”。

饶州(今江西鄱阳县)，药业本较兴旺。《夷坚志》记载：“饶州民郭瑞友患翳膜障蔽，得知獭掌散、熊胆丸可治。到市上买二药，得獭掌散，点之不效。后得熊胆丸方，即依方市药，旬日乃成，服之二十余日，药尽眼明”^[11]。熊胆丸用药17味：熊胆一分，黄连、蜜蒙花、羌活各半两，防己二两半，龙胆草、蛇蛻、地骨皮、大木贼、仙灵脾各一两，瞿麦、旋复花、甘菊花各半两，蕤仁一钱半，麒麟竭一钱，蔓菁子一合，研末，羯羊肝一具，作丸。麒麟竭即血竭，为活血消肿止痛药，时从南洋进口。饶州药业能凑齐熊胆丸方，说明经营品种比较齐全。《夷坚志》还记载，饶州世传高家风药铺，居城内德化桥，因用一人手执叉钩、一手牵一黑漆木猪雕像为市招，故得“高屠”雅号，十分著名^{[11]1459}。

蕲州(今湖北蕲春县)，有名医庞安时家数代人业医营药。到庞安时之际，名声更响，四方来求医买药多得日满其门。距蕲州西南30里(1里=500m，下同)的蕲口镇(今蕲河镇)，处于蕲水入长江之口，是一个居民繁错的水码头。南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诗人陆游复官调任夔州(今重庆奉节)通

判时，坐船溯长江而上。船至蕲口镇靠岸，陆游下船买熟药。没想到的是，蕲口镇药肆经营品种十分齐全，连一些鲜药引子也有供应，令他十分赞赏。

成都，有50万人口，药业较前更加兴盛。著名药业是唐慎微的医家药铺。唐慎微蜀州晋原(今成都崇州市)人，出身世医之家，元祐年间(1086—1094年)应成都知府李端伯招迁居成都。唐慎微在为医中收集方药资料，写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载药1748种，影响医药界500年之久。但宋代成都药业以药市发展最为突出，每年有大慈寺、玉局观两地多次举行的定期药市，吸引了全国多地药商参与交易。川产的川芎、大黄、巴豆、巴戟天等15种药材，被《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用川、巴字头的处方名收载。市场上最著名的成药是供急救用的解毒丸，一丸卖到一千文钱。成都可誉为宋朝的药都。

广州，继承唐代地位是宋朝的外贸中心。数以万计的外国商人及其家属常驻这里。大约60种外国药材和60种中国药材在这里装卸进出。进口药以犀角、象牙、香药居多。宋朝政府在这里获得了丰厚的外贸收入，本地商人则发挥己之所长，开辟了生产经营的新门路。受大食国优质蔷薇香水启发，广州药商开始研制本地香水。《铁围山丛谈》记载：“今广州仿外国造香水，则不能得其蔷薇，只好取素馨花、茉莉花为之，亦足袭人眼鼻”^{[4]98}，是一个开创性成果。还曾有广州药商潘成长途贩运香药到成都药市交易，获利丰厚成为富商。

2.2 药市

药市是出售药品的场所，有常年药市和定期药市2种市场形式。本文特指定期药市，首先在四川蓬勃发展起来，先后有梓州药市、成都大慈寺药市和成都玉局观药市三处。在四川众多的蚕市中，还有药农卖药的小药市。定期药市结束，本地药商仍在市场上常年经营。

2.2.1 蚕市中的小药市 在一年一度蜀地众多蚕市中，有药农卖药的“小药市”。南宋史学家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三月辛巳(30日)，比部郎中蔡文使西川还，言川、峡每春州县聚游人货药，谓之药市，望令禁止。上曰：远方各从其俗，不可禁也。”^[12]蜀人黄休复《茅亭客话》，记载了蜀中蚕市概况和一批卖药人：“蜀有蚕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成

都)及属县循环一十五处,耆旧相传……因是货蚕农之具及花木果草药什物。有鬻龙骨叟,与孙儿辈,将龙骨、齿、角、头、脊之类,凡数担,至暮,货之亦尽。”同书还记载华阳县村民采枸杞根、青城山村民采薯药在市场上售卖^[13]。

2.2.2 梓州药市 梓州药市起于唐末大中十三年(859年)九月九日,起初是八日夜至九日晨的一宿夜市,到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1年)延长到3天。南宋人陈元靓《岁时广记·置药市》中有明确记载:“唐,王昌遇,梓州人,得道,号易元子,大中十三年九月九日上升。自是以来,天下货药辈,皆于九月初集梓州城。八日夜,于州院街易元(道观名)龙池中,货其所资之药,川俗因谓之药市。递明而散。逮国朝天圣中,燕龙图肃知郡事,又展为三日,至十一日而罢。药市之起,自唐王昌遇始也。”^[14-15]

2.2.3 成都大慈寺药市 宋人蔡絛回忆北宋事,于南宋初写成《铁围山丛谈》记载:“往时川蜀俗喜行毒,而成都故事,岁以天中(5月5日)、重阳(9月9日)时开大慈寺,多聚人物,出百货。其间号名药市者,于是有于窗穴间呼‘货药’一声,人识其意,亟投以千钱,乃从窗穴间度药一粒,号‘解毒丸’,故一粒可救一人命。”^[4,15]

2.2.4 成都玉局观药市 成都玉局观,东汉名玉局治,唐时避唐高宗李治讳改玉局化,宋承之,但南宋时有人称玉局观。玉局观药市地点,最初并不在玉局观而在州南门,开市只重阳日1天,后扩大到2~5天。很多宋人都有明确记载。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田况任益州知州。田况喜游乐,写有21首成都邀乐诗,其中一首名《重阳日州南门药市》,首次用诗歌形式记载了北宋中期成都举办药市的时间、地点和名称:时间是九月九日重阳日1天,地点在州南门前空地,称呼全称为“成都南门重阳日药市”^[15]。诗存明人《全蜀艺文志》。原文及译文如下。

原文

岷峨旁礴天西南,灵滋秀气中潜含。
草木瑰富百药具,山民采撷知辛甘。
成都府门重阳市,远近凑集争赏欣。
市人谄谀亦射利,颇觉良恶相追参。
旁观有叟意气古,肌面黧毛鬢鬢。
卖药数种人罕识,单衣结绶和阴岚。
成都处士足传记,劝戒之外多奇谈。

盛言每岁重阳市,屡有仙迹交尘凡。
俗流闻此动非觊,不识妙理徒规贪。
惟期幸遇化金术,未肯投足栖崑崙。
予于神仙无所求,一离常道非所耽。
但喜见民药货售,归助农业增耒蓁。

译文

岷峨山雄卧西南,温湿雾气山中盘。
草木富集百药聚,山民采集亦香甜。
成都府门重阳市,远近来药争售欢。
诡诈商人只为利,感知良奸杂相参。
观旁一老意气古,长发蓬松瘦黑面。
卖药数种人罕识,线缝单衣风飘然。
成都处士传过头,劝戒之外多奇谈。
述说每年重阳市,常有仙人会凡间。
世俗闻此动非贪,不识奥妙求枉然。
惟望幸遇化金术,不再投足攀高险。
我对神仙无所求,绝离人间非所愿。
只乐见民药快售,回家助农添锄镰。

这首诗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首次对北宋成都南门药市举办的时间、地点、名称作了官方记载,但场面、规模记载不足。地点在州南门前,距离玉局观还有一里许,说明宋仁宗庆历时规模不大,是北宋成都玉局观药市的初始阶段。二是全诗24句,言神仙(道士)药市卖药占14句。表达高明的医术、高效的药品只有神仙才能掌握。这是医药业发展水平还不很高的表现,人们渴求有高水平的医药服务。另外,其他宋文也有道士在药市卖药记载。三是州南门药市中,有不少是附近的农民卖药,说明他们是非专业药商,卖药为补助生计和添置农具。

嘉祐二年(1057年),北宋文史学家宋祁(998—1061年)在成都任益州知州。他在所著《益部方物略记》中记载:“成都九月九日药市……芎与大黄如积,香溢于廛(存放地方)……今医家最贵川芎、川大黄。”又记载:药市上有优质的彰明严重及一两的大附子出卖^[15-16]。

陈元靓《岁时广记·吸药气》对成都药市记载较详。他说:“成都九月九日为药市,诘旦尽一川所出药草异物与道人毕集。帅守置酒行市以乐之,别设酒以犒道人。是日早,士人尽入市中,相传以为吸药气愈疾,令人康宁。”^{[14]93}

大意是说:“成都九月九日举办药市。早晨,全川所出药材及珍稀之物和卖药人全都集中在市场上。成都帅守(知府、知州统称)举杯祝贺开市使大家都

很高兴。他还另外设酒欢迎前来参加药市交易的同道之人。这天一早,官员们和老百姓都到药市中进行深呼吸,相传吸进药气可以治病,令人健康安宁。”^[15]

这种官、商、民共庆,大家都来吸药气愈疾场面,反映药市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政治地位有很大提高。

政和年间(1111—1118年),进士江少虞在《宋朝事实类苑》中记载益州药市:“四远皆集,其药物多,品甚众,凡三日而罢。”^[17]

成都南门重九药市南宋初发展到鼎盛,形成了以玉局观为中心、定期举办、有州府最高长官携随员参与巡市的大型药材交易专业市场。宋代笔记作家庄季裕绍兴三年(1113年)写的《鸡肋篇》中记载了成都重九药市:“重九药市,于谯门外至玉局化、五门,设肆以货百药,犀麝之类皆堆积,府尹、监司皆步行以阅。又于五门之下设大尊(酒器),容数十斛,置杯杓,凡名道人者皆恣饮,如是者五日。”^[18]大概此时,成都重九药市已习称为成都玉局观药市。

南宋史学家祝穆,在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年)写成著名的地理著作《方輿胜览》,他在成都风俗“蚕市药市条”中记载:“成都古蚕丛氏之国,其民重蚕事,故一岁之中,二月望日(十五日)鬻花木、蚕器于其所者号蚕市;五月鬻香、药于观街者号药市;鬻器用者号七宝市”^[19]。

时成都有内外两道城墙。内城墙南门就称南门,又称“谯门”,因城楼上建有瞭望台而得名。外城墙南门名“得贤门”,因门上建有得贤楼而得名,又因楼下开有五道城门俗称五门。出谯门往左一里有道观玉局化^[20]。所以,谯门、玉局化、五门,三者大致在一条长数里呈阿拉伯“7”字形的折线上。五门城楼巍峨华丽,城门内外,北自谯门,中经玉局化,南到五门,是繁华的商业区和游览地。尤以药市著名。五门设酒,证实了陈元靓成都药市帅守置酒迎宾记载。

成都人喜欢香药,国外香药是成都药市的重要商品。《方輿胜览》说成都“五月鬻香、药于观街者号药市”,说明成都玉局观药市形成就与卖香药有关。因而药市上外国香药货源充足,来路广泛。《岭外代答·卷五》记载:蜀地大商人贩运蜀锦至广南西路钦州(今广西钦州市)博易场,换取交趾国(今越南)香药运回成都销售,一年往返一次,“每博易动

辄数千缗”^[21],生意做得很大。还有人发现除广州商人潘成外,泉州苏姓药商也贩香药往来于成都,富至巨万^[22]。

宋代成都虽有著名的大慈寺药市。但是,真正的药市是以药材商品为主,品种多、数量大、灰渣重,进出运输,车水马龙,需要有玉局化药市那样的广阔户外空间。所以,喜好医药的南宋诗人陆游(1125—1210年)在成都为官时,常去两处药市察看,他在《老学庵笔记·卷六》中对比说:“成都药市以玉局化为最盛,用九月九日。”^[23]

魏华仙^[24]整理发现,宋代玉局观药市有“二月八日、三月九日、九月九日”3次开市,资料来源有《岁华纪丽谱》《成都遨乐诗》。

《岁华纪丽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是元末进士、史学家、成都人费著所作。内容是依时序从正月元日至年末冬至日,逐条记载一年之中的节庆日活动——成都官府和老百姓的庆宴游乐过程,形象生动细致。历代有关元朝成都社会风俗研究都常引用,认为是元代史实。清末成都人傅崇矩^[25]在写《成都通览》时,将费著《岁华纪丽谱》全文,以《元朝之〈成都岁华纪丽谱〉》为题,收入该书《成都之民情风俗》中。与药市有关的内容如下:1)“二月八日,观街药市。早宴大慈寺之设厅,晚宴金绳院。”2)“三月九日,观街药市。早晚宴如二月八日。”3)“九月九日,玉局观药市。宴监司宾僚于旧宣诏亭,晚饮于五门。凡二日。官为幕帘(小帐幕)棚物,以事游观。”

关于为何将《岁华纪丽谱》记载列入宋代史料,谢元鲁^[26]研究认为,《岁华纪丽谱》作者应非元代人费著,而是宋代人。其理由有三:一是《岁华纪丽谱》中若干内容文字是直接抄录宋代相关著作而成,因而涉及的内容、职官、政区沿革均为宋代实际。二是书中涉及的不少寺院,宋代时尚存,宋末元初战乱中已毁,后也未复。三是书中记述的官民游乐、歌舞升平景象,与元军在南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后,3次攻破成都大肆烧杀、城市破败恐怖的实际不相符合。故上述三处药市多人将其归入宋代史料。

至于“观街”在何处有不同说法。魏华仙说在“玉局观前”,笔者十分赞同。玉局观是买药卖药人都熟悉的药市老地方,二月八日、三月九日的卖药人也必然去那里卖药。玉局观庙宇不大,又在大城之内,观前早已形成街道,卖药人都在观前街道设

肆货药,故《方輿胜览》将玉局观药市有时简称为“观街药市”。2次观街药市,是对一年一度重九药市的补充,规模比重九药市小。

可以看出,玉局观药市北宋至南宋前期只九月九日一天开市,以后市期增至2~5天,为秋市。南宋中期增加了二月八日、三月九日2次春市。春秋两季3次开市,市期共不足10天,满足不了市场对药材的常年需求。南宋后期,成都药市发展为沿街设肆货药的常年药市。宋末元初诗人汪元量到过成都,写下了一首《药市》诗,为此提供了史证。诗文为:“蜀乡人是大医王,一道长街尽药香。天下苍生正狼狈,愿分良剂救膏肓。”

南宋经历宋金、宋蒙两场战争,军民伤病大增,国家和民众对药材需求迫切,药商也希望尽快完成购销流转,因而药市变成沿街设肆卖药的常年市场以方便交易;但也有人认为:汪元量《药市》诗写于元初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前后。于是,笔者查找汪元量的相关资料,发现汪元量原来是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甚至被认为是宋元时期的杜甫。他写成都药市诗,具有相当的传奇性。

汪元量(1241—1317年),钱塘人。南宋后期至元朝初期诗人,兼南宋宫廷乐师。1276年,蒙古军占领南宋京城临安,不满6岁的小皇帝赵显在母亲(全皇后)、祖母(谢太皇太后)的带领和朝官们陪同下向蒙军献城投降,南宋三宫人员被送京城大都向元世祖忽必烈行“朝觐之礼”。赵显一行到京,忽必烈很快召见,并封赵显瀛国公爵位。赵显的祖母、母亲都封爵受到较好安置。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赵显18岁,忽必烈对赵显母子重新作了安排:赐钱令赵显去吐蕃(今西藏)出家学佛;令其母出家为尼;令汪元量出家为道士,并令汪元量到成都完成送赵显入藏的使命。故汪元量到成都时受到了官府的接待,游览了市容和名胜古迹,见到了成都药市。汪元量只送赵显母子到川藏边境而止,后回家乡一带游历、写诗至终。赵显入藏为喇嘛35年,潜心学习藏文、研究藏佛,终成藏佛界著名学者和翻译家,成为一段历史奇事^[27-28]。

汪元量到成都完成使命时,正值元初经济恢复时期。成都药市恢复发展,只能在宋末药市基础上进行。所以汪元量写的《药市》诗,实际上也是南宋后期成都药市的现实反映。

2.3 药材民族贸易

两宋北边的辽、西夏、金、蒙古,西南的吐蕃、

大理,虽然这些地区与宋朝时有战争,但由于彼此需要,商业贸易从未间断。双方在边境设立官办榷场,进行大宗货物交易,称为互市;小规模榷场又称和市,为边民日常用品交易场所。官府对榷场进行严格管理,监察违禁物品并征收商税。

北宋向辽输出盐、茶、绢、一般药材、硫黄、焰硝及香药、犀角、象牙等。辽向北宋输出马、羊、骆驼、皮毛及珍珠(北珠)和人参等药材。

北宋用丝织品与西夏交易甘草及牛羊;用香药、生姜、玉桂、漆器等交易西夏的蜜蜡、麝香、羚羊角、硝砂、柴胡、苁蓉、红花。西夏的枸杞、大黄颇负盛名,是商人贩运各地的大宗药材。西夏也与西边的回鹘贸易,商品中有药材和香药。运往宋地的回鹘商品,西夏则收1/10的过境税。

大理、吐蕃政权用马匹和麝香、牛黄、犀角、珍珠、水银及其他地产药材,换取宋朝的盐、茶、锦、纸等商品。吐蕃首领还常遣使献贡马匹,求得宋廷回赐茶、药、袈衣(全套衣物)、金带等物。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五月,吐蕃首领铎督禀报,部落有疾病流行。宋真宗即“诏赐白龙脑、犀角、硫黄、安息香、白紫石英等药,凡七十六种”^[29],进行了一次有力的救助。

大理政权也常向宋乞贡,以换取宋廷回赐。《宋史·外国四》记载: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二月,大理遣使“至京师,贡马三百八十四匹及麝香、牛黄、细毡、碧玕山诸物。制(皇帝的命令)以其王段和誉为金紫光禄大夫(正三品)、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一级勋号)、大理国王。”

2.4 制药作坊

官药局的制药作坊先名“修合药所”,后定名为“和剂局”。北宋徽宗时已发展到2所,每所30人,设在京城开封。南宋高宗时设和剂局1所,设在京城临安太府寺内。和剂局生产由“修合官”负责,运作以《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为配本。配本始于元丰年间的《太医局方》,后经过历时150年的5次修订。大观年间修订后名《和剂局方》,绍兴、嘉定、宝庆、淳祐修订后名《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最后定型的南宋淳祐本《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共10卷,按主治分为治诸风、治伤寒、治一切气、治痰饮、治诸虚、治痼冷、治积热、治泻痢、治眼目疾、治咽喉口齿、治杂病、治疮肿折伤、治妇人诸疾和治小儿诸疾14门,另有诸汤、诸香2门,共16门,

载方788首。书中记载药品生产剂型主要是丸剂、散剂和煮散剂。也有标明为汤、煎、饮剂的,但实查其商品形态,都是“为末或为粗末”水煎服的煮散剂,每卷都有这种情况。如卷一的小续命汤,卷二的小柴胡汤,卷三的理中汤、木香流气饮,卷四的茯苓半夏汤,卷五的黄芪建中汤、清心莲子饮,卷六的龙脑饮子、黄芪汤,卷七的荆芥汤,卷八的常山饮,卷九的胶艾汤、虎珀泽兰煎,卷十的清涼饮子等^[30]。另有少数内服膏剂、外用油膏剂、膏药剂及锭剂、熨剂、灸条剂。丸剂主要是蜜丸,另有水丸、糊丸、蜡丸和半浓缩丸。全书后附《指南总论》上中下3卷19篇,卷上中的《论炮炙三品药石类例》,为炮制规范,对185种药材炮制方法作了明确规定。《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成为宋朝制药的国家法定标准。

和剂局的规模、设备,两宋京城官药局均无记载。唯一所见,是南宋平江府地方官药局“济民药局”写的《济民药局记》。济民药局有房屋35间,炮制场所,制剂之地,驻局监官与现场药官,以及生活设施库房、粮仓、厨房、浴室,制药设备火炉、石磨、煮药锅、石冲窝,两边排列井然有序,无不全备。建筑总共花消工匠、木料、石料费用,钱以缗计,用去7845缗;米以石计,消耗323石。建成后,又以2万缗钱充流动资金,为采购药材、物品费。凡是川广水陆之产,金石草木之品,没有珍贵药材不被买回,不因产地遥远不去采购。济民药局宗旨是:希望有益大众,故制药求真;不求赢利超过太府寺官药局,故售价低廉。平江府济民药局的投资、规模、设备,都超过了北宋初建的开封官药局^[31]。

民营药业也建有制药作坊。周密《武林旧事·作坊》共记15种作坊,“熟药圆散”作坊和“生药饮片”作坊排在前2位,并说药铺去作坊购进“已成之物”,可得“十一之利”^[32],利不算高。可惜周密无两者更详细的介绍。

2.5 药材种植业

宋代有小规模的官营药材种植场——太医局设置的300亩(1亩 $\approx 666.67\text{ m}^2$,下同)药园。药园由2名药园师指导,招收8名青年为药园生,学习种药和采收加工。毕业后留园或分配到地方从药。所种药材多为太医局医用的鲜药,未形成药材商品投入市场流通。太医局本是国家医学校,药园实为太

医局培养药材种植人才的药学部,药业体系包含农工商三大部门,宋朝政府早有明确认识。

药农自种药材的品种较多。郑金生《宋代本草史》统计:有人工栽培的药材,《本草图经》记载77种,其他本草及笔记、方志记载61种,合计有138种,除去粮、果、蔬类仍有80余种,但是绝大多数并未形成规模种植。唯一形成规模种植的有2个地方的2种药材:蜀地彰明的附子和浙江东北部的茯苓。

彰明县(今四川绵阳江油市彰明镇)附子种植面积10400亩,年产干附子16万斤以上,是彰明农村一项重要产业,也是全国附子、天雄、川乌的生产基地。产新季节,近至川陕,远至闽浙,都有药商前来采购。彰明县令杨天惠写了一篇专论《彰明附子记》,记述彰明附子所产乡镇、种植规模、栽培方法、采收加工、商品规格、形态特征、优劣鉴别及市场销售、药农收入等情况,并批评了本草书中一些错误说法,是一篇较为全面、权威的附子专论。该文存于南宋人赵与时所著《宾退录·卷三》。现据当代《经史百家医录》所载《宾退录》原文摘录开头一段:“绵州故广汉地,领县八,惟彰明出附子。彰明领乡二十,惟赤水、廉水、会昌、昌明宜附子。总四乡之地,为田五百二十顷有奇,然秔稻之田五,菽粟之田三,而附子之田止居其二焉。合四乡之产,得附子一十六万斤已上。然赤水为多,廉水次之,而会昌、昌明所出微甚。”^[33]笔者写有一篇《北宋杨天惠〈彰明附子记〉译评》可供参考^[3]。

值得特别赞赏的是宋代茯苓栽培法创新。茯苓梁代已知用砍倒松树,让其自然生长茯苓的粗放法生产。《本草经集注》说“形多小,虚赤不佳”。南宋时,浙江药农用鲜的小茯苓,夹在松材内的“肉引”法繁殖,3年长成大苓。这一珍贵创举记录在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种茯苓》中:“茯苓生于大松根之尚矣。近世村民乃择其小者,以大松根破而系于其中,而紧束之,使脂液渗入于内。然后择地之沃者,坎而瘞之。三年乃取,则成大苓矣。洞霄山最宜茯苓。往往民多盗种密志之而去,数年后乃取焉。种者多越人。”^[34]释义为:茯苓寄生在大松根之上。近世乡村农民选择小的鲜茯苓,取大松根一段破开,将鲜苓系于其中,再捆紧松根,使松根的汁液能够渗入鲜苓之内。然后选择肥沃之地,挖坑埋之。经过3年后挖取,就长成大茯苓了。浙江余杭县(今浙江杭州市余杭区)境的洞霄山最适宜种

茯苓。村民常是独自偷种留下隐密标记而去,几年后再来收取。种茯苓者多是浙江东北部昔日的越国人。说明用此法种茯苓非个别人,而是有一定群体性和地域性。

宋代浙东北茯苓、川北附子出现规模种植,官方和民间的成药、饮片作坊兴起以及城市药铺普及、药市繁荣,标志宋代药业的农工商体系初步形成。

宋代茯苓“肉引”种植法一直沿用至20世纪70年代初。后湖北省中药材公司在华中农业大学扬新美教授指导下,完成了“茯苓纯菌丝菌种”研究,随即用茯苓纯菌丝接种繁殖成功。茯苓大田生产由“菌引法”取代了流行千年的“肉引法”。如今,茯苓产地扩大到南方多省,彰明至今仍是全国附子主产地。

参考文献

- [1] 徐松.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二之三七[M]. 北京:中华书局,1994:2878.
- [2] 唐廷猷. 古代官药局五百年[J]. 中国现代中药,2014,16(7):591-596.
- [3] 唐廷猷. 北宋徽宗朝药政文书《和剂局方·进表》译评[J]. 中国现代中药,2016,18(12):1537-1541.
- [4] 蔡條. 铁围山丛谈:卷六[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5] 赖存理. 回族商业史[M].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87.
- [6] 周密. 癸辛杂识:别集上[M]//湖北省中医研究院. 经史百家医录. 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86:8.
- [7] 周密. 武林旧事:卷六·小纪[M].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127-129.
- [8] 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卷三[M].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
- [9] 吴自牧. 梦粱录:卷十三[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105-107.
- [10] 西湖老人. 西湖老人繁胜录:诸行市[M].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18.
- [11] 洪迈. 夷坚志:第2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12]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第6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5:1658.
- [13] 黄休复. 茅亭客话:卷九[M]. 影印本. 北京:四库馆,1781(清乾隆四十六年):3-6.
- [14] 陈元靓. 岁时广记[M]//翦伯赞,郑天挺.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5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5] 唐廷猷. 古今药市一千年[J]. 中国现代中药,2014,16(8):674-680.
- [16] 宋祁. 益部方物略记[M]//陈梦雷. 古今图书集成:草木典. 蒋廷锡,校订. 北京:中华书局,1985:66307.
- [17] 江少虞. 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九[M]//陶御风,朱邦贤,洪丕谟. 历代笔记医事别录. 天津:天津科技出版社,1988:19.
- [18] 庄绰. 鸡肋编:成都重九药市[M]. 北京:中华书局,2016:76.
- [19] 祝穆. 方輶胜览:卷五十一[M]. 北京:中华书局,2003:906.
- [20] 王斌. 成都玉局观建置考[J]. 道教研究,2012(4):86-91.
- [21] 周去非. 岭外代答:卷五[M]. 杨武泉,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1999:89.
- [22] 黄纯艳. 论宋代进口品的营销[J]. 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9,15(6):31-37.
- [23] 陆游. 老学庵笔记:卷六[M]//陶御风,朱邦贤,洪丕谟. 历代笔记医事别录. 天津:天津科技出版社,1988:19.
- [24] 魏华仙. 宋代官府力量与成都节日市场[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3,40(1):159-168.
- [25] 傅崇矩. 成都通览[M]. 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99.
- [26] 谢元鲁. 《岁华纪丽谱》《笺纸谱》《蜀锦谱》作者考[J]. 中华文化论坛,2005(2):21-26.
- [27] 王果. 元朝诗人汪元量的成都行迹[N]. 华西都市报,2019-04-25(12).
- [28] 曹金洪. 中国历代帝王:宋·二年皇子——宋恭帝赵显[M].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513-514.
- [29] 脱脱. 宋史:第40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77:14151.
- [30] 太平惠民和剂局.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22-371.
- [31] 唐廷猷. 南宋吴渊《济民药局记》译评[J]. 中国现代中药,2015,17(9):974-976.
- [32] 周密. 武林旧事:卷六[M].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120.
- [33] 杨天惠·彰明附子记[M]//湖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经史百家医录:药物. 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88:524-525.
- [34] 周密. 癸辛杂识续集:卷上[M]. 影印本. 北京:四库馆,1781(清乾隆四十六年):47.

(收稿日期:2020-06-16 编辑:周鹭)